

· 国外经济学家评介 ·

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罗知 李奇军 陈济冬

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兴起一股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蒂莫西·贝斯利教授是这一学术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遵循着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贝斯利在该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政治委托—代理框架分析代议制民主在政治过程中的遴选效应与规约效应;二是建立了有关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人均收入三者关系的“发展集群”理论体系,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选择的内生机制等进行了分析。贝斯利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实证计量方法分析政治经济学,并取得许多颇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成果,成为新政治经济学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关键词:蒂莫西·贝斯利 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委托—代理模型 发展集群

一、引言

自19世纪晚期作为一个独立分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从一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大讨论中复苏,政治经济学经过庇古、罗宾斯、凯恩斯、阿罗、唐斯、布坎南等众多杰出学者的阐述和发展,历经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流派的发展,再到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建立(蔡继明、王成伟,2012),新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变革,代议制民主、私人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等观念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散与建立,有关不同制度选择所引发的经济效应差异、制度选择的内生决定机制等问题得到了主流学界的广泛关注,新政治经济学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增长之谜的回答一直遵循缺乏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传统分析路径(Besley & Persson, 2010),然而新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开始聚焦于落后国家缺乏资

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根源(Besley & Persson, 2011b),也因此涌现出以森(2002)、Alesina(1996, 1999, 2000)、Persson et al(2000)、Acemoglu et al(2001, 2003, 2008, 2011)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先锋。而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这位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级讲席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贝斯利1961年出生于英国,早年就读于艾尔斯伯里文法学校,随后进入牛津大学求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1995年返回英国任职。目前,贝斯利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讲席教授。2006—2009年曾担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外部成员,2015年起担任英国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现任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会长,2018年将担任计量经济学协会会长。由于在“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贝斯利于2005年获得欧洲经济学联合会(EER)颁发的中青年欧洲经济学家

* 罗知,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luozhi@whu.edu.cn;李奇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lqj2014whu@163.com;陈济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jidongchern@126.com。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多维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数量测度”(71373186);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创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竞争环境研究”(15ZDA027)。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最高奖 Yrjö Jahnsson 奖。

贝斯利运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独具创意的阐释,成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使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典范,为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杰出贡献。一方面,贝斯利在规范(normative)视角下的福利经济学和政府自利属性假设下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分野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探讨民主体制对政治立宪的两大核心目标——遴选与激励的作用上贡献了诸多颇具洞见的观点。其中,受惠于主流经济学领域内不完全信息理论(imperfect information)的发展,贝斯利将委托—代理理论引入到政治经济学模型是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大亮点。另一方面,贝斯利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发展集群”(development clusters)这一概念,为梳理有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政治冲突(political violence)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经验关系,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描绘。相比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贝斯利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仅论证了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基础,还考察了政治冲突的体制根源与经济绩效,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完善了有关制度选择过程中的微观基础,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委托—代理模型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对“政府失灵”的研究

委托—代理模型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分析市场主体行为的研究方式,贝斯利则假设存在某种政府失灵,创新性地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到新政治经济学领域。

1. 政府失灵的定义。贝斯利将政府失灵定义为:那些由经济行为人(指政府)垄断性地合法行使权力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Besley & Coate, 1998; Besley, 2007b)。例如,政府由于无法准确掌握私人对公共品的评价从而导致对公共品的次优供给,公共品提供的林达尔—萨缪尔森原则无法实现,最终产生政府失灵。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的运作模式出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体制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这种政府失灵(Besley, 2007b)。

2. 政府失灵的三种判断标准。贝斯利总结了政府失灵的三种判断标准,指出它们各自建立在相应

的理论假设之上,在特定政治决策过程会产生不同的评判结果。

(1)帕累托低效率标准。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8; Besley, 2007b)认为,政府失灵的帕累托低效率标准是对福利经济学中市场失灵概念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直接应用,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效用可能性边界。社会效用可能性边界是政府决策和私人资源配置方案的一个集合,在这个集合上任何个体都不能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来改善个体福利。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不能在帕累托意义的可能性边界上达成分配的状况,对应于政府失灵概念,即是政府所选择的政策不能在社会效用可能性边界上达成分配的状态。

(2)分配失灵标准。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8; Besley, 2007b)指出,以分配失灵标准界定的政府失灵是建立在社会福利函数和社会剩余的理论基础之上,政府失灵被定义为政治过程没有使得公民的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剩余达到最优水平。这也是现代政治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中探讨的一个本质问题:个体的偏好如何汇总成社会偏好以及最终的公共政策。

(3)维克赛尔失灵标准。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8; Besley, 2007b)强调,在维克赛尔标准下,政策选择或者政治决策必须能够引致帕累托占优于政府缺失状态下所达成的结果,而如果政府决策导致的现状比初始状态还要差,那么就存在维克赛尔标准下的政府失灵。

以上三种政府失灵标准,各自有相应的应用条件及缺陷。贝斯利(Besley, 2007b)指出,帕累托低效率标准的缺陷在于,在这一标准下,给定一种初始状态,一个独裁者把整个社会资源都转移到自己或其亲信手中均可被认定为符合政治均衡,即不存在政府失灵。分配失灵标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当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偏好共识时,它所立足的社会福利函数是无法在逻辑上自洽的。这一逻辑就是阿罗在其“不可能性定理”中提到的,同时满足几类最基本社会原则的非独裁式的社会福利函数根本不存在。维克赛尔失灵标准则大大限制了通过特定政治过程进行资源再配置的可能,以至于维克赛尔失灵被认为是一个对政府干预合法性极为保守的判别标准。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在这一判别标准下,如果资源的初始配置是不公的,那么这一

状态就会贯穿整个历史,而无法由政府来合法地加以改变。

3. 政府失灵的原因。为了说明政府失灵的原因,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8)首先定义了有效的均衡政策,即在各个阶段,基于对未来通过民主程序达成的政策预期,当前不存在其他的政策选择可以提高全体公民的预期收益。然后,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8, 2007b)从公共部门投资角度来解释政府失灵的三个原因:无知(ignorance)、私人影响力(private influence)(即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领导素质(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从而为他后来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民主体制在官员选取、保持激励两大核心问题上如何消除或者至少规避信息不对称发挥制度作用的研究奠定基础。

4. 政府失灵的对策与分析方法。在应对政府失灵方面,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事前的宪法条款,即在无知之幕后(behind a veil of ignorance)制定相关的政治博弈规则,在此规则的约束下进行政治资源的配置。可以看出,贝斯利是遵循这一分析传统的,但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这一系列宪法条款选择问题的讨论主要依赖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理论模型,即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其中政治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模型的关键假设(Besley & Case, 1995a; Besley & Coate, 1998; Besley, 2007b)。由此,贝斯利将政治委托—代理理论嵌入到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博弈规则之中,为分析官员选取以及保持激励这两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分析方法。

(二)政治委托—代理模型下的选举问责机制

在隐含假设存在政府失灵的前提下,对政府加以规约(monitoring)就成为贝斯利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根据政治代理理论,由于选民把权力授予给决策者,使后者具有相当的信息优势,导致决策者极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有必要通过相应的监督机制来最小化决策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必要选举那些从动机上更可能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决策者。前者涉及监督问题,后者涉及遴选问题(Besley & Case, 1995a; Besley, 2007b),而民主选举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机制。这两大问题本质上就是信息经济学里面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

lection)问题。

在遴选机制方面,贝斯利等(Besley & Coate, 1997)研究了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决策问题,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中讨论了公民是否参与竞选的决策、公民投票的决策和获胜的竞选者的政策决策。在选举均衡框架下,获胜的竞选者将兑现他的政治许诺。贝斯利(Besley, 2007b)认为选举保障了政治可信性,提高了被选举者的质量。

进一步,贝斯利利用政治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代议制民主选举如何在监督和遴选两方面发挥政治问责作用。在基准模型中,贝斯利分析了政治委托—代理理论在政府质量、在位者优势、任期效应等政治经济学议题中的应用。而通过对模型的扩展,贝斯利又讨论了政治极化、竞争、不确定性以及信息披露对选举的政治问责机制所产生的影响。

1. 政府质量。政府质量表现为对在位政治家的规约系数、后备政治家素养和政治轮换率(rate of political turnover)三方面。较高的规约系数、较高的后备政治家素养以及较低的政治轮换率意味着一个高质量的政府(Besley & Case, 1995a)。贝斯利等(Besley & Case, 1995a; Besley, 2007b)利用模型分析发现,随着规约系数的上升,选举可以对政治家施加一种激励,使那些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会在一定条件下保持自律,模仿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以期在未来继续享用租金收入,而这将促进选民当期福利的提升。同时,选民福利还随后备政治家素养的上升而增加,与政治轮换率之间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2. 在位者优势。与政治委托—代理理论下选举相关的另一个应用是在位者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理论。贝斯利(Besley, 2007b)认为,在位者优势出现的原因是其与挑战者机遇的不对称。因为对挑战者来说,他并没有机会向选民发信号用来展示其是否属于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而在位者可以在选举之前做出这种明示。

3. 任期效应。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向我们表明,政治家的行为与其职业生涯的长短相关,即考虑到是否能再次参选,政治家的行为是有差异的(Besley & Case, 1995a)。把那些能够再参选与不能再参选的政治家行为进行比较,可以识别出任期效应(term limit effect)。委托—代理模型的这一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官员任期内末期效应的经验检验。

贝斯利等(Besley & Case, 1995a, 1995b)的研究侧重于通过对面临任期限制的在位州长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内差异的比较来检验是否存在任期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很多政策指标都与任期限制相关, 尤其是税收和政府支出。对存在任期限制的州而言, 由于任期约束从紧, 第二任期内税收和政府支出水平都高于上一任期。贝斯利等认为, 似乎正是这种任期限制导致了财政周期的出现。

4. 不确定性、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与竞争。贝斯利考虑了选举过程中的随机性、政治极化现象和政治竞争对选举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的影响。选举不确定性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存在与政策无关的其他因素影响政治家受欢迎的程度; 二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 选民往往只从候选人中随机选定一位来执政; 三是由于选民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极化现象是指各群体内部对特定政策存在彼此不兼容的看法, 这可能源于意识形态、种族等方面的差异。贝斯利(Besley, 2007a, 2007b)的研究认为: (1)随着选举过程中不确定性增强, 选举对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的规约能力会降低, 因而, 选举过程中的噪音将弱化选举机制对政治家的问责效力; (2)如果具有党派归属的选民比例充分多, 即政治极化现象非常严重, 那么也将不存在有效的问责机制; (3)政治竞争可以削弱极化现象的不利影响, 当缺乏政治竞争时, 极化现象本身才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综上, 选举问责机制规约政治家行为的一个相对理想状态为: 选举过程存在较少的噪音; 选民间存在较少的极化现象; 各党派之间政治竞争势均力敌。

5. 政策性信息与非政策性信息。在政治互动中, 政治均衡受到选民所掌握信息的影响, 贝斯利等(Besley & Smart, 2007)使用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信息对政治问责机制的作用结果。贝斯利在这方面的独到贡献在于界定了两类信息——政策性信息与非政策性信息, 并识别出它们对选举问责机制的影响差异。贝斯利(Besley, 2007b)发现, 随着政策性信息的披露程度扩大, 在位者采取政策的整体质量将会提升, 从而增加选民福利。贝斯利等(Besley & Burgess, 2002)在对印度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信息的充分流动可以提高政府对自然灾害的应对速度, 独立的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一步地, 贝斯利等(Besley & Prat, 2006)研究了媒体独立性

的内生决定因素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 认为媒体的独立性取决于读者驱动型的商业利润与政府合谋的收益二者之间的权衡, 众多的媒体数量和独立的所有权性质减少了媒体被政府俘获的概率。另一方面, 政府对媒体的俘获给政策结果带来两种负面影响: 一种体现为道德风险,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客由于预期被发现未服务于选民利益的概率较低而更有可能攫取租金收入。另一种体现为逆向选择, 即那些本质上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候选人无法被识别或被剔除出来。

然而, 非政策性信息的披露程度对选民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 它有助于选民甄别出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 促进预期福利。但另一方面, 由于它会降低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政治家获得连任的概率, 从而削弱选民对政策效果的关注, 降低选举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的抑制作用, 损害选民的当期福利。特别地, 当后备政治家素养普遍较低时, 即当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比例充分大时, 基于上述逻辑, 更高程度的非政策性信息披露将很可能降低选民福利。贝斯利(Besley, 2007b)据此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启示: 在评估信息披露效应时, 应该审慎地对政治家的规约效应和对合意政治家的遴选效应进行权衡。如果整个政治家群体的质量降低, 那么对政治家的规约效应就应该占优于遴选效应。相反, 遴选效应则更加值得关注。

6. 选举扭曲与曲意逢迎现象。虽然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能够对政治代理中的遴选与规约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这也解释了代议制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广泛存在的理论逻辑。但是, 贝斯利(Besley, 2007b)强调, 委托—代理理论问题的存在还有可能导致选举制度本身产生扭曲(distortion)。具体而言, 由于政治家掌握着比选民更多而且更优质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政治家本该做出的选择可能会与选民的偏好相冲突, 但选举的激励却会推动政治家过多地根据选民的喜好选择政策, 而非根据其掌握的信息做出决策, 从而产生低质量的政治决策、造成扭曲, 这就是政治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曲意逢迎(pandering)现象。但这并不是对选举机制的存在提出无条件的否定。贝斯利认为, 如果能从一开始就保证执政的政治家是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 选举机制就纯粹是扭曲之源。但相应地, 只

要政治家可能属于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类型,那么选举机制就能够发挥规约作用。

(三)政治委托—代理模型下选举机制在公共财政理论中的应用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贝斯利将委托—代理模型应用到具体的公共财政模型中,来研究选举激励对公共财政决策的影响,包括对总体税收水平和对政治家选择租金与公共支出平衡的影响。

1. 基本结论。(1)当只考虑逆向选择问题时,由于政治家不能影响其可能攫取的租金数量,贝斯利等(Besley & Case, 1995a; Besley, 2007b)证明,如果单位公共品的供给成本为高水平的概率较大时,无论税收水平是高或低,选民都会支持在位者留任。如果单位公共品的供给成本为高水平的概率较小时,则制定了低税收水平的政治家将留任,未致力于服务选民利益的政治家将下台。(2)当只考虑道德风险问题时,所有政治家都被假设为“坏的”,都怀有攫取租金的动机。此时,只有当公共品成本较低或选民对该成本的估计比较确定时,政府的支出水平才会较低,进而出现小政府。(3)当同时考虑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均衡结果,分别为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和杂合均衡(hybrid equilibrium)。在分离均衡下,“坏的”政治家会攫取最大化的租金,并必然被识别出来。在混同均衡和杂合均衡下,在位政治家攫取的租金低于最大化的租金水平,而被识别出来的概率也更低(Besley & Smart, 2007; Besley, 2007b)。

2. 非选举限制。贝斯利等(Besley & Smart, 2007; Besley, 2007b)指出,作为核心激励机制的选举本身并不完美。为此,如果选举机制在改善规约效应,或是选择更好的政治家(遴选效应)方面没有作用的话,那么选举外的限制就将是唯一可以约束政府的方式。

贝斯利等(Besley & Smart, 2007)提供了两种对政府规模的限制方式。一种是直接限制方式,即对政府可征收最大税收水平做一个宪法上的刚性约束。另一种是间接限制,如降低税收效率。贝斯利(Besley, 2007b)认为只有当规约效应大于遴选效应时,也就是自利型政客占多数的情况下,直接限制才有助于增加选民福利。而在间接限制下,降低税收体系的效率可以限制自利官员所能攫取租金的规

模,从而防止整个政府支出中的浪费,同时对政府规模实现约束。贝斯利(Besley, 2007b)认为,只有当税收体系效率的降低能导致选民发现“坏的”在位者的概率增大时,间接限制(即降低税收效率)才可以提升选民福利。

3. 逻辑拓展。贝斯利(Besley, 2007b)最后将规约效应与遴选效应的分析逻辑运用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品的情形中。以发展援助为例,援助的存在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激励模式,恶化对在位者的规约水平。而非政府组织由于有必要服从各种可能的问责机制,面临更大程度的规约,寻租的可能性较低。即使假设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具有相同的激励结构,然而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更强的遴选效应,即能雇佣一些更优秀的员工,因此,它们更有能力通过实施援助为民众谋取利益。这些都将导致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援助的过程中更有效。

三、繁荣之柱与发展集群

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方面,贝斯利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将政治委托—代理理论应用到选举机制及其政治问责效应中,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方面,贝斯利及其主要合作者佩尔森(T. Persson)所取得的创新则是关于发展集群(development clusters)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分析经常事先假设存在一个有效的国家,它可以有效地征税、保障合约执行、组织公共事业建设,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以分析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应对措施。然而,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0)认为,有效国家模式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征税和协议保障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脆弱的国家制度才是世界失序的根源。

贝斯利与佩尔森的发展集群概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最终落脚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上,对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鸿沟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剖析,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为解开世界发展差异之谜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发展集群的政治经济学

发展集群在贝斯利和佩尔森的理论框架中是指一国内部较高的国家能力、较少的政治冲突和较高的人均收入三者之间的正向关联。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0, 2014a)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定义为一国政府为本国居民及企业执行若干政策和服务的制度性能力,包括财政能力(fiscal capacity)、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和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city)。财政能力侧重于国家的攫取性角色,衡量的是为了能从公民所得中征税,一国需要具备的行政管理、监督和执行能力。法律能力侧重于国家的生产性角色,衡量的是一国是否有诸如法院、高素质法官、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保障等,法律能力有助于促进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Besley & Persson, 2009a)。集体能力是国家相对于市场的补充作用,体现为公共品的供给(Besley & Persson, 2014a)。发展集群并不是指相邻国家政治发展的紧密关联,而是关注一国内部各发展方面的紧密关联。这一概念构成了贝斯利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基石。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09b, 2010, 2011b)从经验层面的发展集群现象出发,通过考察政府在位者对国家能力的投资决策模型,各群体对政治冲突的投资决策模型,构建了一个国家空间学说,最终旨在回答三个主要问题:(1)什么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国家能力,为什么这些能力总是一同变动?(2)什么因素导致了政治冲突及其不同形式?(3)什么因素可以解释国家体制、政治冲突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发展集群现象?

(二)国家能力与政治冲突

1. 财政能力。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09b, 2011b, 2013)在模型中指出,财政能力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水平,在位者对财政能力的投资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轮换率的影响。为了衡量一国的财政能力,他们将税收分解成贸易税和所得税,其中所得税的征收代表财政能力。这是因为,政府征集贸易税相对简单,而征收所得税则要求政府在决策执行、协商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对政府能力的要求较高(Besley & Persson, 2014a)。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 Besley, 2013)将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国家财政能力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大规模的所得税征收需要一个卓有成效的税收体系,包括监督、执法、训练有素的税务督察员和有效率的税收服务,而这些正是一国财政能力的含义。

(1) 财政能力的决定因素。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2013; Besley & Persson, 2014b)认为影

响国家财政能力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公众对公共支出的价值认可、非税收收入(如发展援助和自然资源)和税收遵从文化。

关于经济发展因素,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2013; Besley & Persson, 2014b)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正规经济活动逐渐成为主导,例如,更多的劳动者在合法注册的企业中就业而不是自我雇佣(Kleven et al, 2009),更多的金融交易是通过正式的中介(如银行)(Gordon & Li, 2009)完成。这些交易对于政府来说都是可监测的,这些不断增加的正规经济活动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促进了对财政能力的投资。

对于政治结构因素,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09b, 2010, 2011b; Besley et al, 2013)十分强调政治凝聚性(cohesiveness)和稳定性(stability)。他们指出,财政能力投资的边际收益是财政能力提高能够增加未来的公共收入,其边际成本是更高的税收将导致私人收益更少。这意味着在位者投资财政能力的充要条件是:未来公共收入的价值必须等于私人消费的价值。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证明了这一条件取决于政治凝聚性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其中,凝聚性表示政治体制具有宪法规约性,表现为分权与制衡以及对少数派的保护。稳定性表示政治轮换率较低,一国政治越不稳定,政治轮换率就越大。他们在研究中指出,随着政治体制变得更有凝聚力,政府将把税收更多地花费在公共品上而不是在转移支付上。然而,当政治凝聚性较弱时,统治者可能会为了筹集税收收入而被动地去投资财政能力,并最终将税收收入用到转移支付上。就政治稳定性而言,更高的政治轮换率会抑制财政能力的投资动机。

有关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3)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社会结构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为统治者的特性。他们认为,来自高收入群体的统治者往往倾向于低税率,从而策略性地降低财政能力投资。社会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是收入不平等。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时,来自富裕群体的在位者对财政能力的投资动机将进一步降低。极化是他们界定的社会结构的第三个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的极化偏好同样会降低财政能力投资。

关于公众对公共支出的价值认可对财政能力的

影响, 贝斯利和佩尔森等 (Besley & Persson, 2008a; Besley et al, 2013) 则是将外部战争威胁作为对公众有关公共产品的价值认可的冲击来进行研究。他们指出, 这一冲击促使整个社会朝着共同利益体型的状态推进, 或者使社会从脆弱国家状态向再分配型国家的状态推进, 即战争塑造了社会偏好, 减少了极化, 刺激了财政能力的投资。

贝斯利和佩尔森 (Besley & Persson, 2013, 2014b) 指出, 非税收收入也是影响财政能力的重要因素, 例如自然资源和发展援助都影响税收收入的边际价值, 因此对国家财政能力的投资至关重要。他们认为预期到的发展援助会降低财政能力投资, 而现有的非税收收入可以降低短期投资的成本, 从而增加了短期的投资动机。

此外, 贝斯利和佩尔森 (Besley & Persson, 2013, 2014b) 还考察了税收遵从文化的影响。税收遵从文化代表着一国居民遵守税法的社会氛围, 那些具有较高税收遵从文化的国家, 由于居民普遍遵守税法, 因此更容易实现财政能力的提高。

(2) 三种国家形态。在此基础上, 考虑现实中对政治凝聚性和稳定性两大条件的偏离, 贝斯利和佩尔森 (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3, 2014a) 推导出三种偏离基准模型的均衡结果, 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形态: 第一种是共同利益体型国家, 其政治凝聚性条件成立; 第二种是再分配型国家, 其凝聚性条件不成立但稳定性条件成立; 第三种是脆弱型国家, 其政治凝聚性和稳定性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在共同利益体型的国家中, 存在一个正的财政能力投资水平。因为政治凝聚性条件保证了公共资源在各个群体中的分配是平等的, 这种制度约束使得不管第二期谁执政、不管人们对公共品的价值认可度的高低, 在位者都会相信公共资源在第二期会被用于服务公共利益, 这给了在位者投资财政能力的信心 (Besley & Persson, 2011b; Besley et al, 2013)。而在再分配型的国家里, 凝聚性条件不成立导致人们对公共品的价值认可度较低, 公共收入的一部分预期会被用于转移支付, 此时政治稳定性确保了存在一个正的财政能力投资。因为在再分配型的国家里, 对财政能力的投资决策取决于未来得到转移支付的预期, 而从这种预期中获得收益必须要求在位者连任的概率非常大 (Besley & Persson, 2011b, Besley et al, 2013)。最后, 在脆弱型的国家

中, 由于凝聚性条件和稳定性条件都不成立, 在位者投资财政能力的预期边际收益一方面要用于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还很有可能完全被在位者攫取, 最终导致在位者缺乏投资财政能力的激励。总之, 脆弱型的国家政治凝聚性低、无法保障公共利益, 更高的政治轮换率意味着政治极不稳定, 国家发展税基、建设国家财政能力的动力非常弱, 脆弱型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失灵 (Besley & Persson, 2011b, Besley et al, 2013)。

(3) 极化、收入不平等与群体规模差异。在拓展的模型中, 贝斯利和佩尔森 (Besley & Persson, 2011b) 考察了极化与异质性、收入不平等、群体规模差异等财政能力投资的微观基础。他们认为更高的极化现象会削弱公共利益诉求, 降低未来公共收入的预期价值。尤其当政治凝聚性条件不成立时, 极化现象会降低国家财政能力的投资水平, 并提高一国经济体处于脆弱形态的可能性。同时, 在位者对财政能力投资的多少还取决于经济政治权力的联合分布, 比如在位者是富有还是贫穷。另外, 执政群体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财政能力投资。

2. 法律能力。贝斯利和佩尔森 (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 从刘易斯的结构主义观点出发, 认为国家贫穷的根源在于其缺乏有效使用资本、劳动和其他稀缺要素的能力, 低效运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是经济贫穷的核心。因此, 国家法律能力投资的重要性得到彰显。

(1) 含义。与财政能力决定一国税收水平类似, 法律能力决定了对不同群体的法律支持力度, 后者决定了各群体的收入水平。法律能力投资具体表现为法院体系的建设、雇佣和培训法官等体制维护 (Besley & Persson, 2011b)。

(2) 产权。贝斯利等 (Besley, 1995; Besley & Ghatak, 2009) 指出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 而是受经济和政治的推动, 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化。贝斯利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产权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产权体系是被什么因素决定的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 贝斯利等 (Besley et al, 2012) 认为, 产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分为两大类: 首先, 产权可以限制掠夺; 其次, 产权可以便利市场交易。产权在限制掠夺中发挥的作用具体又可以表现为: 第一, 通过限制掠夺风险, 产权可以提高投资的动机; 第二, 节省为了保护产权而额外浪费掉的

私人资源。他们认为,产权改善可以提高生产性劳动力,经济效率也将随着产权保护的改善而提高(Besley, 1995; Besley & Ghatak, 2009)。产权在便利市场交易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可以表现为:第一,产权便利了资产的贸易;第二,产权提高了资产的可抵押性,从而便利了信贷交易,缓解了信贷约束(Besley, 1995; Besley & Ghatak, 2009)。

关于第二个问题,贝斯利等(Besley & Ghatak, 2009)认为,产权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在产权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它受到声誉机制、退出机制、隐私、公共产权、表达机制以及生产者的异质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3)财政能力与法律能力的互补关系。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认为,投资法律能力的边际收益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未来生产力的直接促进作用;另一部分是由于税基扩大导致公共资源增加带来的间接影响。法律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加收入,从而扩大税基,使得财政能力投资变得更有价值。财政能力的提高也增加了私人收入的价值。因此,财政能力与法律能力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4)国家形态及其决定因素。和财政能力投资模型一样,根据政治凝聚性和政治稳定性条件,法律能力投资模型也相应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形态。对模型参数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在公共利益体型的国家和再分配型的国家内,公共品价值的提高将会增加在位者对国家能力的投资。当体制不具有凝聚性时,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的投资会随着政治稳定性的提高而增加。在扩展的模型中,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认为法律能力的改变可以被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它并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法律能力是增长之源。

3. 政治冲突。在贝斯利发展集群理论框架中,国家能力和政治冲突是两个主要的内生变量,其中国家能力中的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已经通过模型得到分析,而政治冲突在这些模型中被视为外生给定。贝斯利及其合作者利用政治轮换率这个参数将政治冲突纳入模型(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1c, 2014a),考察在位者和反对者对军事力量的投资决策,以及政治冲突对国家能力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1)政治冲突的含义。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0, 2011b, 2011c, 2014a)首先区别了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在国家能力投资模型中,外部冲突的威胁可以通过提升公共利益认同促进国家能力建设。而内部政治冲突是资源再分配争夺中的极端形式,其所代表的政治不稳定是国家能力投资的重要阻碍。

(2)决定因素。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10, 2011b, 2011c; Besley & Reynal-Querol, 2014)假设在位者和反对者都可以选择投资属于自己的军队,反对者在未来取得政权的概率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力量和战斗效率,当投资决策最优化时可以得到一个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09a, 2010, 2011b, 2011c)认为,在共同利益体型的国家中,在位者和反对者对军事力量的投资都是零,此时国内为和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一国有足够的凝聚性或者对公共品的需求足够高,那么就永远不会有政治冲突。如果凝聚性条件不成立,那么政治冲突将随着收益—成本率的变化呈现出三种形式:第一种情形是,存在一个区间,当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小于区间下限时,在位者和反对者的军事力量投资为零,国内为和平状态;第二种情形是,当该比率大于区间上限时,双方军事力量投资均为正数,此时国家处于内战状态;第三种情形是,当该比率处于该区间内,则在位者的军事投资为正数,而反对者的军事投资为零,此时国家处于镇压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当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足够低时,国内和平才可能成为现实。模型还表明,所有能够增加政治冲突概率的因素都会降低国家能力的投资,这在理论上解释了发展集群概念中国家制度与政治冲突之间的共生关系,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决定因子。

(3)实证研究。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08a, 2008b, 2010, 2011b; Besley & Reynal-Querol, 2014)根据上述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支付给士兵的工资增加时,意味着投资战争的边际成本上升,此时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会降低。第二,更高的外生收入,比如自然资源租金或发展援助,将增加一国处于镇压或内战的风险。第三,对公共品的共同利益预期价值认可度越高,投资战争的收益—成本率就越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低。第四,当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监督和制衡能力时,只有当人们对公共品需

求的价值认可度足够高时,才会降低镇压或内战的可能性。

(三)国家空间:安娜·卡列尼娜矩阵

在一个综合核心模型中,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进一步考察了决定政治冲突与国家能力的共同根源。在位者失去执政地位的概率随着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成本和冲突技术(conflict technology)(在位者和反对者从事武装斗争的技术,或者是赢得战争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1)当存在镇压或内战时,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增加会降低在位者失去执政地位的概率;(2)当存在内战时,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成本增加会降低在位者失去执政地位的概率;(3)当存在镇压或内战时,冲突技术的进步会降低在位者失去执政地位的概率。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08a, 2008b, 2011b, 2014a)将私人资本积累纳入到拓展模型中,从而为政治冲突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建立起逻辑链条,得出以下结论:(1)任何提高内战风险的因素都会减少私人投资;(2)收入是资本的增函数,因此更高的战争风险意味着未来更低的收入,因为它减少了私人投资;(3)自然资源的变动会增加再分配型或脆弱型国家的内战风险,这意味着更高的预期资源型收入会提高内战风险,降低私人收入。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的综合模型表明,导致国家滑入脆弱形态陷阱的两条路径分别是低水平的国家能力和政治冲突,而这二者又同时与低收入联系在一起,这为贝斯利的发展集群理论提供了逻辑解释。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将较强的财政能力、法律能力与较少的政治冲突作为经济繁荣的三大

支柱。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a)在发展集群这一理论框架下做出的另一个突出创新在于,他们根据国家的三种形态和政治冲突的三种形式,将国家的状态归纳在一个 3×3 的矩阵中,形成他们的国家空间学说,见表1。高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和公共利益诉求保证了一个处于和平状态下的共同利益体型的国家。而脆弱型或再分配型国家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内战状态下的脆弱型国家是由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和高水平的自然资源决定的。而内战状态下的再分配型国家在这些条件之外还要加上高水平的冲突技术。可以发现,国家空间学说矩阵的右上角状态——即和平状态下的共同利益体型国家只受单一条件决定,而再分配型国家和脆弱型国家却受到不同条件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贝斯利和佩尔森根据这一特征,借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其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篇题文,独具匠心地将此矩阵命名为国家空间学说的“安娜·卡列尼娜矩阵”(Anna Karenina matrix)(Besley & Persson, 2011a, 2011b, 2014a)。

(四)发展援助:鲍尔悖论与资源诅咒

在政治委托—代理模型中,贝斯利根据规约效应与遴选效应考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得到援助之后提供公共品效率上的差异。而在繁荣之柱的框架下,贝斯利则分析的是发展援助在何种制度条件下能够达成预期效果以及发展援助对制度本身的诱导作用。

不同于传统观点,贝斯利认为发展援助的作用取决于受援国的制度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发展援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Besley & Persson, 2011a, 2011b)。具体来看,在一个公共利益体

表1 国家空间学说的“安娜·卡列尼娜矩阵”

| | 脆弱型 | 再分配型 | 共同利益体型 |
|----|--|--|------------------|
| 和平 | 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冲突技术、自然资源,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 | 高水平的公共利益诉求、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 | 高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和公共利益诉求 |
| 镇压 | 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冲突技术、自然资源,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 | 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和自然资源,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和冲突技术 | 不存在 |
| 内战 | 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冲突技术、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高水平的自然资源 | 低水平的政治凝聚力、公共利益诉求和公共品供给边际成本,高水平的冲突技术和自然资源 | 不存在 |

资料来源:Besley & Persson(2011b), Ch. 5, p. 233。

型的国家内,发展援助不管是作为预算援助还是作为直接的项目投资,其效果都不会有差异,因为所有的未来支出都会被用来投资公共品。假如政治凝聚性不成立,人们对公共品的价值认可度较低,则额外获得的资源(发展援助)会被用于转移支付而不是公共品投资。也就是说,只有当制度能力非常强时,发展援助才是值得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与鲍尔悖论(Bauer Paradox)(Bauer, 1972)一致:一个没有能力筹集税收、实行公共项目建设的政府,也没有能力有效地利用发展援助。

发展援助本身又会对制度与国内冲突产生诱导作用。贝斯利从现金援助、技术援助与军事援助的发展援助形式出发,分别考察它们对国家能力与政治冲突的影响。

1. 现金援助。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a, 2011b)指出,发展援助中的现金援助对财政能力和公共品都具有挤出效应。对现金援助的依赖会使国家从公共利益体型逐渐转变为脆弱型或再分配型的国家,削弱国家能力的建设,产生一种资源诅咒的结果。同时,现金援助对政治冲突具有一种援助效应,因为更高的现金援助会增加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从而增加政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当政治体制不具有凝聚性时,外国的发展援助有利于在位者巩固自己的权力,导致更强的政治稳定性,进而增加在位者对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的投资。

2. 技术援助。技术援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致力于降低公共品供给成本的技术;另一种是致力于降低国家能力投资成本的技术。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a, 2011b)认为,一方面技术援助可以增加人们对公共品价值认可度的提高,从而增加国家能力的投资,降低政治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技术援助会提高政治冲突的收益—成本率,从而增加政治冲突的发生概率。

3. 军事援助。军事援助可以增加政治稳定性,从而增加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的投资。在一个脆弱型的国家内,更强的强制统治可以提高政治稳定性和国家能力投资,但这是以加强在位者统治地位为代价的,将导致产生一个收租型国家,反对者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a, 2011b)认为,军事干预虽然可以激励

在位者进行投资,但并不是宪法体系的替代品。

(五)政治改革

政治凝聚性对于培育国内和平、进行国家能力投资至关重要。贝斯利通过放松政治制度外生给定这一假设,进而探讨政治改革,以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拥有具有政治凝聚性的体制,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Besley et al, 2013)。

1. 无知之幕、政治稳定性与制度选择。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11b; Besley et al, 2013)认为,首先,在无知之幕假设下的政治改革往往会得到一个具有凝聚性的政治体制。因为在无知之幕下,公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也不知道在位者属于哪个群体。此时,凝聚性的政治体制可以提供一种承诺来保证所有的支出都会用于公共品。其次,在位者会在被替换概率较高时选择具有凝聚性的体制,而在被替换概率较低时,选择不具有凝聚性的体制。因为当在位者预期自己很可能被替换时,他倾向于在本期建立具有凝聚性的体制来保护自己。这意味着,一个地位十分巩固的在位者是没有激励去投资凝聚性体制的。

2. 制度选择的微观结构。改变政治规则极其困难,为了理解这些改革障碍,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 Besley et al, 2013)从政治凝聚性的微观基础和政治稳定性的微观基础两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制度选择。

一方面,贝斯利和佩尔森等(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 Besley et al, 2013)认为政治凝聚性的微观基础取决于在位者群体在政策决策者中的代表规模和宪法规则,当反对者由于缺乏议价能力或者缺乏完整的保护,而选民没有额外的选择时,一个缺乏凝聚性的体制就会形成。另一方面,他认为政治稳定性的微观基础在于竞争与开放。此外,预期政治轮换率取决于纳什均衡下对冲突的投资,不具有凝聚性政体的代价在于,在位者不得不把资源投入到冲突中,如果这些成本足够大,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具有凝聚性的体制。

总之,在不具有凝聚性的体制下,在位者如果没有能力有效降低自己被替换的概率,那么他会发现选择凝聚性强的体制是最优行为。而如果在位者确实可以降低轮换率,那么要想让在位者实行凝聚性强的体制,必须保证获取的再分配利益大于冲突成本。当政治冲突成本过高(大于再分配利益)时,在

位者就不倾向于使用政治冲突来维持执政地位,而宁愿选择凝聚性体制。

(六)繁荣之柱指数

贝斯利和佩尔森通过对国家财政能力、法律能力投资和政治冲突投资模型的分析,对有关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解释。

1. 什么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国家能力以及为什么这些能力总是一同变动?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0, 2009b, 2011b, 2014a)认为,不同形式的国家能力的投资彼此是互补的,这一方面表现为财政能力与法律能力本身存在互相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决定因素。强烈的共同利益诉求或者极具政治凝聚性的体制将使得在位者形成强烈的投资动机,促使国家能力在两个方面都得到扩张。

2. 什么因素导致了政治冲突及其不同形式?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0, 2009b, 2011b, 2014a)认为政治冲突的根源与缺乏投资国家能力动机的因素是一样的,即较低的公共利益诉求和政治凝聚性。

3. 什么因素可以解释国家能力、政治冲突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发展集群关系?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 Persson, 2011b, 2014a)指出:(1)较高的政治冲突与较弱的国家能力相关联,是因为那些有利于组织反叛的因素将会增加内战的风险,反过来又会削弱投资国家能力建设的动机。(2)收入和冲突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来自于高收入会通过提高投资冲突的机会成本而降低镇压或内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来自于更高的内战风险摧毁了资本积累,降低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从而阻碍收入增长。(3)收入水平与国家能力之间相关,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增加会增强在位者投资国家能力的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也会促进收入的内生增长。

总之,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人均收入之所以出现集群,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正向的反馈机制,从而产生良性或恶性的循环。

贝斯利借用亚当·斯密关于“繁荣之柱”(pillars of prosperity)的说法,将财政能力、法律能力与国内和平作为一国繁荣的三大支柱。贝斯利在模型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国家能力、政治冲突和人均收入三方面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繁荣之柱指数”,用来反映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集群程度,指数越小,说明其发展集群程度越低。经验数据表明,扎伊尔、阿富汗、缅甸、索马里和苏丹等国家的发展集群程度最低,而且从发展集群的构成上看,它们在国家能力、政治冲突和收入水平三个方面也处于最差表现,呈现出一致性。另一方面,瑞典、瑞士、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发展集群程度处于最高水平,其国家能力较强,政治冲突很少且人均收入较高。其中的异常值之一是印度,虽然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较快,但它的税收体系仍不发达、市场摩擦严重,并且内部政治冲突臭名昭著。

贝斯利还比较了根据现实数据构造的繁荣之柱指数和根据理论模型中发展集群决定因素构造的繁荣之柱指数,两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贝斯利的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经济增长模型确实具有较好的现实解释能力。当然,一些系数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偏离,这说明模型在考虑诸如领导人特性等极端个案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四、简评

贝斯利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是将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杰出典范。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在19世纪晚期才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母体,但其对政治规则、政治现象、政府行为等的经济分析,对国家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开创性著作。在吸收福利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唐斯范式等政治经济学各发展阶段中的诸多学术成果后,贝斯利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着手,对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很多重要议题重新进行了一番阐释,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迅猛发展。

贝斯利对政治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鲜明地体现了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即对政治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和激励机制的分析。这与契约理论和组织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一脉相承(Drazen et al, 2000)。20世纪70年代不完全信息理论的兴起以及后来的激励理论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为贝斯利对政治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激励理论和组织经济学主要研究组织和制度内部的委

托一代理和治理问题。在贝斯利的理论逻辑里,政府失灵至少和市场失灵一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贝斯利运用政治委托一代理模型分析政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得到了代议制民主体制和媒体在政治问责中所发挥的规约效应与遴选效应。它们在对利己属性的政府官员实行甄别选拔、激励和约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Besley & Prat, 2006)。在基本的分析框架下,贝斯利还讨论了其他的重要因素和有趣的社会现象,如政治极化、政治竞争、不确定性、媒体竞争和相关的产业政策等。

贝斯利在国家能力方面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并遵循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特征——制度选择的内生性(Drazen et al, 2000)。贝斯利及其主要合作者佩尔森的“发展集群”概念起源于其在经验数据方面的宏观视角。基于这些新的经验证据,他们建立了理论模型来深入理解国家能力建设、政治冲突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等微观机制。将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阐释,不仅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还给出了制度选择的内在基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政治凝聚性与公共利益诉求包含财政能力与法律能力的国家能力建设的关键。贝斯利和佩尔森关于国家能力的微观机理研究展示了特定政治规则对政府官员的规约与激励效应。而财政能力与法律能力的互补性,国家能力建设与政治冲突投资之间的共同根源以及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则是贝斯利和佩尔森关于发展集群现象的本质性解释。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贝斯利对当前备受争议的发展援助以及政治改革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其结论同样是充满洞见的。正如鲍尔悖论所概括的,发展援助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是受援国本身具有足够的国家能力,而具有一定国家能力的国家往往并不是最迫切需要发展援助的。贝斯利关于发展援助的讨论与“资源诅咒”理论一样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性。当内生性地看待制度选择时,会发现政治改革又受到政治凝聚性与政治稳定性的影响。

贝斯利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充满创造性的,这既归功于贝斯利本人卓越的理论洞察力,也受益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验事实的挖掘在近几

十年里的迅猛发展。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利用主流经济学分析工具和实证方法而不断发展,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优秀学者的关注,取得诸多颇具启发性的理论结果,对各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而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基础上,吸收、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有益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而了解与研究贝斯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理论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蒂莫西·贝斯利,2009:《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 蔡继明 王成伟,2012:《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兼评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第9期。
- Acemoglu, D. (2003),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620—652.
- Acemoglu, D. et al(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1369—1401.
- Acemoglu, D. et al(2008), “Political economy of mechanisms”, *Econometrica* 76(3):619—641.
- Acemoglu, D. et al(2011),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inefficient stat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2):177—208.
- Alesina, A. & D. Dollar(2000), “Who gives foreign aid to whom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33—63.
- Alesina, A. & R. Perotti(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6):1203—1228.
- Alesina, A. et al(1999),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4):1243—1284.
- Bauer, P. T. (1972), *Dissent on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sley, T. (1995),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5):903—937.
- Besley, T. (2007a), “Electoral strategy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Besley, T. (2007b), *Principled Ag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o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sley, T. (2013), “Making and breaking tax systems”,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s* 44(3):297—321.
- Besley, T. & R. Burgess(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415—1551.
- Besley, T. & A. Case(1995a), “Doe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ffect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Evidence from gubernatorial term limi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2(2):187—221.
- Besley, T. & A. Case(1995b), “Incumbent behavior: Vote seeking, tax 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1):25—45.
- Besley, T. & S. Coate(1997), “An economic model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1):85—114.
- Besley, T. & S. Coate(1998), “Sources of inefficiency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 dynamic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1):139—56.
- Besley, T. & M. Ghatak(200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 Rodrick & M. Rosenzweig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rth Holland.
- Besley, T. & T. Persson(2008a), “Wars and state capacit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2—3):622—530.
- Besley, T. & T. Persson(2008b), “The incidence of civil war: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585.
- Besley, T. & T. Persson(2009a), “Repression or civil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2):292—297.
- Besley, T. & T. Persson(2009b),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1218—1244.
- Besley, T. & T. Persson(2010),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78(1):1—34.
- Besley, T. & T. Persson(2011a), “Fragile state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3):371—98.
- Besley, T. & T. Persson(2011b),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sley, T. & T. Persson(2011c), “The logic of political violence”, *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 126(3):1411—46.
- Besley, T. & T. Persson(2013),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Auerach et al(eds),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North Holland.
- Besley, T. & T. Persson(2014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State capacity, peace, and incom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6(1):927—949.
- Besley, T. & T. Persson(2014b), “Why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tax so litt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4):99—120.
- Besley, T. & A. Prat(2006), “Handcuffs for the grabbing hand? Media capture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3):720—736.
- Besley, T. & M. Reynal-Querol(2014), “The legacy of historica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Africa”,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 Besley, T. & M. Smart(2007), “Fiscal restraints and voter welfa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3—4):755—773.
- Besley, T., K. B. Burchardi & M. Ghatak(2012), “Incentives and the De Soto effe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1):237—282.
- Besley, T., E. Ilizetzi & T. Persson(2013), “Weak states and steady states: The dynamics of fiscal capac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5(4):205—35.
- Drazen, A., T. Persson, G. Tabellini & G. Saint-Paul(2000),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Recent Books by Allen Drazen and by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4):915—925.
- Gordon, R. & W. Li(2009), “Tax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7—8):855—866.
- Kleven, H. et al(2009), “Why can modern governments tax so much? An agency model of firms as fiscal intermedia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218.
- Persson, T., G. Roland & G. Tabellini(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MIT Press.

(责任编辑:李仁贵)